

# 海外志愿服务发展的话语形成和反思<sup>\*</sup> ①

林 红

**提 要:** 基于文献梳理和行业观察,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海外志愿服务发展的话语形成和反思,本文认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基于20世纪中期确立的国际秩序,通过海外志愿服务的“援助场域”建构起“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作为话语对象、“援助”作为话语陈述方式、“发展”作为话语策略的叙述框架。这套话语叙述在历时性的全球语境变化中经历阶段性演变和消解性反思,成为全球社会现实图景的一种形塑力量。海外志愿服务在当前全球语境下需要超越援助,重建一种基于全新道德共情的全球责任感的广义发展观,所有国家和地区都需要成为负责任的行动主体,走出主客二元叙事框架,超越“援助”的话语陈述方式,重新建构“发展”的话语群或确立新的话语策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 海外志愿服务 援助场域 发展话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一、引 语

海外志愿服务<sup>①</sup>,作为一种“民间外交”(戴闻名,2015),是各国公众开展广泛而深入跨文化交流的平台化渠道,对增进各国民众相互了解和认同有着无可估量的重要性(赵启正,2011:17—22)。它不仅是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的行动载体,也是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的具体路径。如果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向“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世界提供的一套国际话语方

---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质量基础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6ZDA079;主持人:陈光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重点学科发展社会学建设”“中国社会发展综合指标集成实验室”“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等项目支持。作者感谢以上资助,文责自负。

① 海外志愿服务亦称为国际志愿服务,指区别于国内志愿服务的、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的、以国际发展援助为宗旨的志愿服务;但是,“海外”这一定语相较于“国际”一词更加清晰地指出了此类志愿服务区别于国内志愿的地理属性,这也是海外志愿服务与国内志愿服务区分的关键性特征,故本文采用“海外志愿服务”,但会根据语境适当使用“国际志愿服务”这一表述。

案,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无疑再次证实了这一话语的有效性;那么,海外志愿服务则为之提供了具象化的行动路径,并赋予这一行动方式新的话语内涵。

话语的本质是一种权力关系,它意味着哪些主体有发言权,哪些主体无发言权;一些群体或个体要保持沉默,或者他们的话语被认为不值得关注,言语系统能够在情感和思想层面上产生压制;尽管它是一种隐蔽、表面上无行为人的控制系统,但是社会中一种真实的权力(郑乐平,2003:65)。福柯采用话语构成分析方法,呈现了权力如何在各种规训手段支持下渗透到社会事实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其分析路径超越了语言学式的话语研究和心理学式的精神分析局限,把社会事实客体化为一种话语形成过程,而权力无疑是支配这一过程的核心。福柯(2003:41)认为,话语的形成取决于能否在对象、陈述行为、概念和主题选择之间确定某种规律性。一套话语包含对象、陈述方式、概念、策略等要素,前二者侧重话语主体的分析视角,后者侧重实践过程的分析视角。本文借用福柯关于话语形成的分析路径,将其确立的话语要素进一步结构化为“话语对象—陈述方式—话语策略”的分析框架,把海外志愿服务作为一个总体性的研究客体,尝试对其在国际发展行动场域中呈现的权力面貌展开历时性的厘清和共时性的审视。

## 二、话语主体

话语对象的形成通过区别(“测定它们出现的表层”)、定义(“描述界限的审定”)、分类(“分析规格的格局”)三种方式的共同作用实现(福柯,2003:44—45);话语陈述方式以主体及其话语对象所处的相对位置为描述前提,由“谁在说话”、说话的场域(“话语可以找到其合理起源及其应用点的机制所在地点”)、主体的位置(“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范围或群体有可能占据的处境”)三个要素构成(福柯,2003:54—56)。换言之,对象是话语主体通过区别、定义、分类三种方式建构的客体,话语主体的身份、位置和言说语境则决定了话语陈述方式。

### (一)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作为话语对象

20世纪50年代,随着战后国际发展体系的建立,旨在推动发展项目实施的国

际志愿服务正式应运而生。新建立的国际体系通过“北半球和南半球”“发达和欠发达”“三个世界”等理论重新定义世界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与北半球各政治主体形成区分，确立了“南—北”的世界形态分类模式，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输出海外志愿服务的目的地；并在“发展”被确定为一种全球责任后，进一步成为国际发展话语建构的对象，以承载“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援助“发展”过程中输出的各种关系、价值、身份、知识和技术（Lewis, 2006）。

国际体系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类型化建构通过“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众想象进一步客体化，从而完成话语主体从宏观抽象到微观具体的转化。以英国为例，作为较早派出海外志愿者的国家，它在这一领域的实践不仅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诸多借鉴，某种程度而言也为全球海外志愿服务发展提供了模式、路径、政策和反思的参照。海外志愿服务是当代英国公众想象的重要构成，被认为能够重塑其国内公民个体和组织/机构的权利责任观，重建英国在国际合作、南北关系、发展行动中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它获得诸多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包括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各方日益共享一种叙事话语即强调国际志愿服务能够培养志愿者改变全球不平等的能力，或者能够帮助志愿者在海外志愿服务结束返回后获得某种专业身份。这套话语的另一面是，英国推行的海外志愿服务承载了殖民主义资源开发、青年发展等任务行动，具有国际发展和知识转移领域的技术至上等多种理念渊源，被视为英国国内政策需求的外延；其发展至今，已从最初殖民象征的权利关系转变为全球化和后帝国主义语境下的一种权利和责任表达，从英国国际发展署<sup>①</sup>的表述“志愿者将亲历不同国家面临的贫困挑战并见证援助如何为之带来改变”（Smith & Laurie, 2011）可得一见。

英国的海外志愿服务社作为如上公众想象的践行者，是极具代表性的。该机构始建于1958年，在朴茨茅斯主教的来信请求下，其创始人招募了16名英国志愿者到东南亚的加里曼丹（旧称婆罗洲）教授英语，后来从一家英国的慈善机构逐步发

---

<sup>①</sup> 英国国际发展署（the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为“DFID”），现为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the Foreign, Commonwealth & Development Office，简称为“FCDO”），参见链接：<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department-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最后登录日期：2021年4月15日）。由于英国国际发展署在国际发展领域的长期影响，且本文写作时尚未更改，故本文继续沿用“英国国际发展署”。

展成为一个旨在通过志愿服务行动消除全球贫困的国际发展机构，每年向全球各地派遣志愿者，秉持“分享技能，改变生活”的理念，让志愿者向当地民众分享其专业技能，共同学习和创新，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美好”的世界。目前，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已在全球7个国家建立了志愿者招募基地，相继在加拿大、荷兰、肯尼亚、乌干达、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建立伙伴机构，逐渐发展为国际联盟的形式。其国际志愿者可以从各基地进行招募，分派到任何一个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的项目中。例如，从爱尔兰招募的志愿者可能会被派遣到尼泊尔工作，从乌干达招募的志愿者可能会被派到塔吉克斯坦工作。2011年，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与其他组织/机构合作，推出了国际公民服务项目。该项目最初由英国国际发展署支持，后来资金来源又增加了雷励国际和泪水基金，每年向全球60余个国家派出3000多名志愿者。在过去60余年里，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在全球范围内已累计招募超过80000名志愿者，并通过各类型的国际发展项目派遣至非洲、亚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东欧等90多个贫困国家和地区开展志愿服务，全球累计受益人数超过5000万。仅2019—2020两年间，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向非洲和亚洲20余个国家共派出志愿者4158名，志愿服务项目主要涉及健康、教育、生计三大议题，受益人群达450万人。<sup>①</sup>

以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为代表的国际志愿服务组织，植根于传教活动、殖民主义（Lewis, 2006），致力于探索未知和倡导年轻人的反叛精神（Simpson, 2004），并坚信通过技术性解决方案和知识转移能够实现发展的目标，其发展历程很大程度上呈现了当代国际发展援助实践的样态。虽然非政府组织可能是英国后帝国时代最初增长时期的倡导者和海外志愿服务的推动者，但随着近年关于发展的认知转变、发展领域的专业化提升、全球公民发展空间与行动主义的兴起，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和公民意识提升（Windsor, 2006），志愿服务领域、企业部门和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出现（Bondi & Laurie, 2005），越来越多的行动主体陆续参与其中。在当下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的组织者已非常多元，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三大部门中的各类主体。例如英国国际发展署、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埃森哲国际咨询公司等，形成了一个多元参与的行动格局。但是，不论国际志愿服务提供者如何多元，“欠发

<sup>①</sup> 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官方网站，《2019—20年度回顾》（<https://www.vsointernational.org/about/annual-review>），最后登录日期：2021年4月15日。

达国家和地区”作为国际志愿服务接受者的客体化身份并未得到实质改变，只是在不同阶段被投射的公众想象有所不同而已。

## (二) “援助”作为话语陈述方式

二战后确立的国际体系不仅使得“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话语表述对象，同时确立了“援助”作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话语陈述方式。国际发展干预措施创造了一种援助场域 (aidland)，一种“拥有其自身真理的平行宇宙” (Apthorpe, 2011)，一种拥有既定仪式、象征和语言的“泡影” (Harrison, 2013)。其中，“发达国家和地区”作为“援助”的提供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作为“援助”的接受方，“援助场域”作为一种言说语境，共同构成了“发展”话语的陈述方式。

1951年的澳大利亚研究生志愿计划是第一个将志愿者送到海外开展发展援助服务的民间社会倡议 (Sobocinska, 2016)。这一模式迅速传到英国、加拿大和美国 (Frontani & Taylor, 2009)，很快被各国政府接受。因为在各国看来，海外志愿服务有助于其建立与各后殖民地国家/地区的关系 (Sobocinska, 2017)。1961年，美国和平队成立，这是第一个由政府发起的海外志愿服务项目；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并组建了联合国志愿者组织，负责推动全球范围的国际志愿服务发展。海外志愿服务以国际发展为目标导向，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前所未有地动员了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领域各类主体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从英国的海外志愿服务社、日本和韩国的国际协力机构，到绿色和平组织、医生无国界、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组织，再到联合国志愿者组织，海外志愿服务将其80%的资源投向全世界127个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志愿服务相关能力建设。海外志愿服务不仅在诸多西方国家，也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各国成为官方发展援助的重要构成。并且，基于2000—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和2016—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展海外志愿服务逐渐成为一种全球共识。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志愿组织向全球派遣的志愿者数量规模大、覆盖地理范围广、服务内容和形式多样。比如，美国和平队近50年来先后派遣了20余万名志愿者到139个国家开展国际志愿服务。再比如，日本的青年志愿者被派遣到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服务内容涉及扶贫、医疗、教育等160多种技术行业。与此同时，服务理念也逐步确立。20世纪50年代发起的澳大利亚研究生志愿计划的志愿者坚

持“与国民<sup>①</sup>一道，在相同的工资水平和条件下工作”（Brown，2011），这种平等姿态是志愿者被誉为“发展的公共性面孔”的道德基础。这些海外志愿服务项目旨在援助接受方的发展，其志愿者大部分在全球最贫困或者被国际社会定义为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工作、生活。其中，约一半的志愿者远离都市，长时期投身偏远地区的发展。海外志愿者在其服务期内以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专业的技术服务，与受助国家和地区的地方民众建立了真实的生活连接。志愿者们树立了派出国的国家形象，促进了跨国语境下援助方和受助方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以一种个体化的方式将“援助”和“被援助”的关系具象化，使“援助场域”成为一种客观实在。如果说，在国际话语交往实践中，能否成功建构一套嵌入了自己国家价值内核并受到世界民众接受和认可的国际规范，是衡量一个民族国家的话语实践是否具有国际合法性或是否拥有话语权力的重要标尺（袁三标、陈国栋，2013），那么，以“援助”为话语陈述方式的海外志愿服务无疑提供了一条成功的参考路径。

### 三、话语过程

一直以来，海外志愿服务被视为进入发展领域的一种仪式（Smillie，1995: 15）。概念层面，所谓“发展”，作为动词的共识性定义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 352）。实践层面，“发展”作为一个总体性事实是由系列陈述构成的一个话语群，话语样态的最终呈现取决于话语主体和表述对象之间的相互建构。如果说概念层面的“发展”是一种认知化的“能指”，那么实践层面的“发展”就是一种实践性的“所指”，认知表述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实践意义的一致性。通过海外志愿服务实践予以呈现的“发展”意涵在国际援助场域中被具象为一套话语策略和话语群，并伴随国际援助的发展过程而演化出阶段性内涵。福柯（2003: 33）指出，“如果分散在时间中的不同形式的陈述只参照同一对象的话，它们便形成一个整体”，由此，“它们的形式和连贯类型”构成一系列描写陈述。这显示，话语的构建不仅指向话

<sup>①</sup> “国民”即作为志愿服务对象的当地民众。

语概念的形成和策略的选择，还指向了时间性，是一个“这种描述在不断的变动”的过程（福柯，2003：33）。

### （一）“发展”作为话语策略选择

海外志愿服务以国际援助的方式有力地支持了西方国家的对外战略，成为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实现文化扩张、经济援助、政治和社会渗透的重要组成部分（腾素芬，2011）。这些输出均被赋予了“发展”的名义，成为海外志愿服务的主题，即一种话语策略。它“标志着某种分类的连接点”（福柯，2003：70—71），通过“发展”的话语策略把被分类为“欠发达”和“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连接起来，构建出完整的援助场域。话语策略的选择“并不直接从属于这样或那样的说话主体的世界观或者从首要利益中产生，而是因为策略选择的可能性本身是由概念作用中的分歧点确定的”（福柯，2003：78）。换言之，“发展”被选择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实际上是二战后世界新秩序基于各种“概念作用中的分歧点”而达成的一种共识结果，是发达和欠发达、北半球和南半球、三个世界等不同分类的“连接点”。

在海外志愿服务的早期发展阶段，志愿者受到基督教传教士、殖民传统中的人道主义以及战后现代化思想的影响，以强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技能和灌输知识的志愿服务方式参与到当时的后殖民政治体系建构中（Franco & Shahrokh，2015），成为发展话语下“发达”和“欠发达”世界之间的行动连接点。二战后，各国——例如瑞典政府于1962年、加拿大政府于1959年、美国于1961年——陆续建立致力于国际发展的专门机构，以便继续参与前殖民地的发展。而志愿服务的海外输出即是这一背景下国际发展援助的重要构成，或者说重要的实现途径。一方面，在许多国家成功摆脱殖民统治后的数十年以来，国际发展演变成为现代化、民主化和结构性调整的代名词（Perold et al.，2013）；另一方面，殖民主义建构并持续形塑了当今世界的各种发展政策和实践，而发展型志愿服务一直以来都深受其影响（Howard & Burns，2015）。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殖民主义扩张是国际发展援助的一种驱动力，这一判定主要源于对主体的重新定义：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工作者自视或被视为“救世主”；另一方面，志愿者接收机构和当地人自视或被视为需要来自所谓发达世界的那些“英雄人物”拯救的“困苦者”。例如英国的“平台2”（Platform2）项目，这是一个由英国国际发展署出资1000万英镑，联合英国北美大

学俱乐部和基督救援会共同成立的为期 3 年的伙伴计划，旨在把年轻的英国弱势群体作为国际志愿者派遣到海外。这个计划最初的合作伙伴还包括伊斯兰救济会，这体现了现英国政府新近的特别关注点，即基于信仰的发展（Rakodi, 2007），也继承了前英国政府在其发展议程中对信仰作用的认可，尤其是基于信仰的志愿服务的作用。这一计划于 2008 年 2 月启动，旨在“为海外（项目执行地）带来改变”“在英国提高（公众）认识”“个人发展”“促进对全球问题和社会凝聚力的理解”（Smith & Laurie, 2011），把国际志愿服务与英国国内更广泛的社会包容政策议程联系起来。有学者认为，一方面，该项目的操作方法不仅与志愿服务的职业化趋势相悖，也和企业利用“间隔年”（gap year）<sup>①</sup>开展减贫行动所体现的发展项目商品化的理念不同；另一方面，该项目也反映出，英国在直接参与南半球的发展过程中，把国内的社会政策、发展意识、教育需求与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直接联系起来，导致南半球成为英国实现其国内各种政策需求的工具（Smith & Laurie, 2011），英国国际发展署的政策也成为殖民权力关系的延续（Biccum, 2007）。

发展的话语表述不断将景观、领土、地区、位置、距离、边界和现状可视化，通过一种苛刻的二元逻辑方式进行地景画像和地域区分（Crush, 1995: 14; Crossley, 2012）。以往关于发展志愿服务的研究亦以此话语逻辑为预设，强调“这里（here）”（指代作为援助方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和“那里（there）”（指代作为受援方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区分。这种区分用地理性位置作为“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区隔性的具象呈现，成为支撑该领域所有研究的前提假设：实践中，“贫穷”和“发展”之间区隔化的地理想象和空间化特征往往有助于国际发展志愿服务经验的规范化（Yea, 2018）。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发展相关的研究聚焦一般是南半球，而不是发展议题本身，例如北半球的发展教育（Humble & Smith, 2007）。在发展的话语系统中，尤其二战后至冷战结束期间，被国际秩序定义为“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一类去主体性的被陈述客体，成为各类“发展”资源输出的目的地。作为想象者的“发达”国家民众和作为被想象者的“落后”国家民众在海外志愿服务建构的援助场域中相遇，共同完成了关于“发展”的话语建构。

<sup>①</sup> “间隔年”（gap year）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实施多年的一种制度性时间安排，它使得年轻人可以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通过一次长期旅行或游学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增加阅历和拓展视野。这期间，年轻人通常会选择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事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或者参与各类国际志愿服务项目。

## （二）“发展”话语群的演变

如果将“发展”视为海外志愿服务的一种行动语言，那么“发展”相关的各种定义就是这种语言的言语。“发展”作为海外志愿服务的一种话语策略选择，其相关概念陈述“以陈述之间的并存形式为出发点”，“在其中出现和流动的陈述范围的组织”，通过“连续的形式”“一些共存形式”“涉入程序”（可被合理用于陈述的方法和技术）的方式构成一套完整的话语群（福柯，2003：60—78）。在不同时期，“发展”被赋予不同内涵，呈现出海外志愿服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一种历时性方式构成“发展”话语群的演变，并在海外志愿服务的实践中完成从理念到行动的转化。

随着全球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海外志愿服务输出的话语表述也发生了相应的阶段性变化。继新殖民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对海外志愿服务的重新界定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志愿服务发展图景的一个关键特征。新自由主义与那些从历史渊源来说尚未获得广泛认可和充分研究的概念——例如公民、伙伴关系、发展等——相互交织，并以其盛行之势赋予这些概念新的内涵。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下，海外志愿服务强调把世界主义和全球公民身份的理念与实践置于其制度、话语和思想中。如此，思潮中所包含的不平等就通过各种策略在不同的时期嵌入到其地方行动中。这使得，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公民理念得以不受限制地成为一种全球性流动身份认同，或者说一种全球消费主义的身份认同（Smith & Laurie，2011）。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晚近的新自由主义只是被一套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技术官僚程序支配（Peck & Theodore，2010），并不具备这样深刻的内涵。

但不可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为海外志愿服务提供了一种新的动机表述，即强调志愿服务对志愿者个人的能力建设，包括志愿者在海外服务期间和服务结束返回后的能力发展。于是，海外志愿服务被赋予全新的价值内涵：它不仅可以提高志愿者对社会公正和发展的认识，增强志愿者的全球公民意识，还可以提高志愿者的个人技能，从而间接或直接地促进企业效率和个人职业发展。这一重新赋值反映了“发展”话语崩溃和重构的两条线性进程：一方面，它要在不断建构南半球作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又要跳出援助场域的语境，以志愿者的需求和体验为中心重构社会正义和公民权的内涵，进而重新定义国际志愿服务。正是在这种双线的进程下，海外志愿者以一种新的主体身份被纳入国际的“发展”话语中。

对海外志愿者新主体身份的强调，很大程度上源于“发展”的话语论述从新殖民主义（文化研究领域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到新自由主义（文化研究领域的新自由主义

批判)的理论转向,是国际援助场域的话语框架变化的结果。海外志愿者,从海外志愿服务发展初期的“救世主”到新近“全球公民”的身份变化过程,本质上是国际援助场域中“发展”内涵通过“发展”的路径和海外志愿服务目标的阶段性阐释而完成的“发展”话语群建构的过程演化。“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发展”路径的定义决定了海外志愿服务的行动路径,从初期阶段帮助志愿服务接受方实现“现代化”和“基本需求”,到中期阶段提出参与式发展、治理能力建设,再到新近的“基于权利的发展”和“生态位模式”<sup>①</sup>,构成了“发展”话语群演变的基本框架。海外志愿服务目标作为“发展”路径演变的直接体现,也经历了初期阶段以技术援助和知识转移为主调的“善举”,到中期阶段的“相互学习”、公民身份、公民赋权,再到新近的全民身份、社会正义、个体发展、社区建设等变化(Smith & Laurie, 2011)。从“发展”的路径定义到海外志愿服务目标的确立,二者之间实现了有效呼应。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国际援助场域的样态从简单的“南—北”二分结构逐渐演变为全球化的“生态位”模式(niche paradigm)。虽然“发达国家和地区”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主客关系并未改变,后者作为“发展”的话语对象身份也未改变,但前者的自我画像从单纯的“施与者”或者说“救世主”逐渐被赋予更多人格化特征,这也是海外志愿者的新主体身份在国际援助场域得以被看到的主要原因。

某种程度上,旨在通过国际援助帮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各种“发展”愿景的海外志愿服务只是根植于现代国家和全球政治进程的一种社会事实。从殖民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关于“发展”的想象形塑了海外志愿服务的地理图景,为发达国家的海外志愿者提供了参与机会的体制性结构空间。同时,“发展”的话语群也成为海外志愿服务项目实施、行动落地以及调节“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和志愿服务提供方关系的认知基础。

#### 四、话语反思

话语“是一个奇怪的事件”(福柯,2003:29):首先,它不仅同书写的动作或者某句话的连接相关联,还在记忆中,或者在手稿、书籍以及任何形式记录的物质

<sup>①</sup> 也称为“利基模式”,统称公平贸易、族群发展、基于信仰的发展等一类拟生态图式的国际发展路径和趋势。

性中,为自己展开一个暂时存在;其次,它同每一个事件一样,是独一无二的,但又出现在重复、转换和复活的过程中;最后,它不仅与其产生的环境、引起的结果相关联,同时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与其最后的陈述相关联。简而言之,话语不仅具备主体、客体、过程、结果等作为事件叙述的要素,还根植于时代语境,具有一定的反思性。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目标中复兴的发展理念虽然在很大范围内(尤其在北半球)仍旧被新自由主义形塑,但关于“发展”的话语反思也逐渐兴起,尤其是关于“以负责任的自我赋权方式采取行动的现代西方自我”的讨论(Roy, 2010: 12)。从“救世主”到“现代西方自我”,是“西方”作为海外志愿服务话语建构主体的一种自我客体化,是发展话语演变的一种历时性结果,也为反思当下时代语境中的海外志愿服务提供了一个有效切口。

2000年以来,尽管经济增长和自由贸易仍然是发展援助政策的核心,但是全球在发展的目标上逐渐达成一种更具广泛意义的概念内涵,即改善人类福祉。一方面,国际发展援助与各种旨在提高援助效率和发展中国家治理效能的“后新自由主义”政策相互赋能,实现了体量增长(Murray & Overton, 2011)。另一方面,国际发展合作被重新建构为一种“伙伴关系”,发展中国家不再是“受援国”,而是将援助与本国的优先发展事项联系起来、通过“结果导向的管理”形成相互负责的“发展伙伴”(OECD, 1996)。多元主体基于全球公民身份的认同建构,正在通过专业化方式建构一种新的海外志愿服务伙伴关系(Smith & Laurie, 2011)。然而,批判性的观点认为,其一,“结果导向的管理”要求援助接受方根据预先设定的目标对自身绩效负责,即使这些目标不符合当地的真正需求和利益;其二,志愿行动倾向于选择量化产出,而不选择那些无法测量却重要的、可持续的产出作为评估依据。这两者使得援助蓝图的实施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很少考虑当地的历史、社会或地理语境(Eyben, 2010)。相关世界主义辩论的复苏和对所谓“超越国家的思考和感受”的关注,以及对全球正义和对“遥远的陌生人”的关爱,为反思当代海外志愿服务提供了一系列关键讨论(Rovisco, 2009)。当然,发展援助相关的批判性反思源于各种因素,包括志愿者的动机、经验和更广泛的社会关系(Smith et al., 2013)等,主要集中在如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对海外志愿服务有效性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海外志愿服务的发展过程是被各种“发展”的空间想象形塑,援助场域中强调可衡量和产出可预测的新自由主义治理实践盛行,对海外志愿服务是否真正推动(或有助于)“发展”提出了挑战(Schech, 2017),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海外志愿服务短期化。虽然诸多研

究均承认国际志愿服务的人道主义动机，但也认为，志愿旅游作为发展援助的一种新兴形式，由于服务时间短、技能水平低和游客组织的无序性，并未有效实现这一动机（Vrasti & Montsion, 2014）。志愿旅游的主要受益者是志愿者个人。虽然志愿服务对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缓慢而长期的能力建设）很难测量，但诸多研究呈现了志愿者个人技能、知识和态度的变化，并认为海外志愿服务有助于北半球国家实现其培养负责、可就业、国际化新自由主义公民的目标，而不是更有助于满足志愿服务接受方的真实需求。其二是对海外志愿服务质量的质疑。有学者基于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在各国实施的志愿服务项目评估发现，随着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专业化压力增加，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呈现出了一种更商业化的国际发展模式（Turner, 2015）。这种模式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在严格时间期限内获得最大投资回报，虽然这可能会有显著的短期产出和成效，但却可能对海外志愿服务项目旨在建立项目地方拥有感、培育地方领导力、融入地方社会的愿景造成严重的损害。一项对肯尼亚社区志愿服务的研究发现，国际发展组织声称主要行动主体参与了自上而下目标的制定，通常是指协商而不是真正参与（Lewis, 2015: 64）。而一项考察莫桑比克社区志愿服务项目的案例研究则发现，民间社会组织在承接国际志愿服务项目时也可能有自己的次级议程，或者志愿服务的原初目标以某种方式被其他人的政治利益取代（Picken, 2015）。此外，志愿者无法以参与式行动者的角色深度投入地方社会的发展进程，其自我定位、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均会对志愿服务行动的质量产生消极影响（Turner, 2015）。

另一方面是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反思。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用于解释国际志愿活动或许是一个过于狭窄的分析框架（Guiney & Mostafanezhad, 2015）。一项针对 19 个国际志愿服务协调机构的调查显示，志愿领域的从业者担心“在实践中被新自由主义霸权取代”，这很可能会弱化他们促进平等伙伴关系和地方拥有感的行动愿望（Lough & Allum, 2013）。随着志愿服务项目与政府确定的援助重点更为紧密地结合，经济效率和可测量的产出比项目设计的地方适应性或志愿者在回应地方发展议题方面的灵活性更为重要。另一个证据是，随着国际志愿服务转移知识和技术的功能被弱化，短期性国际志愿服务逐渐兴起并成为一种趋势。在短期性的项目中，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之间伙伴关系的新自由主义概念化同样导致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市场化”，公共服务领域的空白越来越多地被非政府主体填补（Howard & Burns, 2015）。于是，国际志愿服务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服务和福利退出后用以支持“那些先进自由计划”的社会行动（Lacey & Ilcan, 2006），以及发展中

国家新自由主义和新管理主义实践的“关键社会调解者”(Georgeou & Engel, 2011)。新自由主义对志愿服务效率尤其是可测量产出和自由市场的强调,不仅导致“援助”接受方的“发展”实践碎片化,还使国际志愿服务背离了其原初的人道主义动机。

新自由主义的另外两副霸权面孔是优先考虑个人选择和基于市场的交换,这充分体现在关于志愿旅游的批判研究中,即把志愿旅游描述为一种消费导向的个人社会行动策略(Butcher & Smith, 2015: 8),是国际发展议程私人化和全球正义商品化的一部分(Mostafanezhad, 2013)。志愿者们在诱导下相信志愿旅游不仅可以让他们在南半球的弱势社区中履行全球责任,还能观察世界、享受乐趣。例如年轻人在“间隔年”通过慈善机构开展社会变革创新行动,正逐渐发展为一种承诺“为全球化时代培养新公民”的商业化产业(Simpson, 2005; Lyons et al., 2012)。志愿者和其接收方之间关系建立的前提是,志愿旅游者作为来自发达国家的、可以负担旅行和志愿服务费用的优势公民拥有一种喊“开始”的权利,而对资本主义和国家间不平等的结构性原因的批判性反思则被掩盖在所谓“关怀和责任”之下(Sin, 2010)。因此,有学者建议,志愿旅游项目的评估方式应该根据其传播创新模式的情感和行动有效性进行评估,而不是根据其向全球贫困人口提供的善意和服务进行评估(Vrasti & Montsion, 2014),使之与旨在实现援助发展的长期性海外志愿服务区分开来。

如果说,以“援助”作为陈述方式的发展话语在海外志愿服务发展的初、中期尚保有一种“救世主”式的人道主义动机,那么近来对海外志愿服务短期化和行动有效性的质疑则使之从这一原初动机剥离开来。一方面,伴随“发展”话语群的演变,“发达国家和地区”和海外志愿者的主体性以一种更为人格化(或者说去神圣化)的方式被带入海外志愿服务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援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海外志愿服务也面临话语解构的风险,即海外志愿服务的客体可能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被替换为(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海外志愿者个体。“援助”的宾语变化将可能导致海外志愿服务一直赖以为基础的发展话语走向消解,或者重建。

## 五、结语

海外志愿服务自20世纪中期以来,基于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发达国家和

地区”通过“援助场域”的诸多实践建构起以“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作为话语对象、“援助”作为话语陈述方式、“发展”作为话语策略选择的国际叙述框架，在历时性的全球语境变化中经历阶段性演变和消解性反思，成为全球社会现实图景的一种形塑力量。近年来，关于“发展”话语的反思，对以往“发达国家和地区”为话语主体建构的海外志愿服务图景构成消解的同时，也为重建一种更为广义的“基于全新道德共情和全球责任的发展观”（Lewis, 2006）提供了可能。以全球共识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或许有助于关于“发展”的想象脱离简单的南—北二元导向，通过连接国际、国家和地方的不同视野，海外志愿服务可以建构相互嵌入的全球关系格局，产生可持续的影响，而不仅是“帮助或援助模式”（Devereux et al., 2017）。海外志愿服务给志愿者带来的影响，虽然难以“对全球共同体形成彻底的意识改变”（Diprose, 2012），但那些把发展实践融入地方历史、地理和社会语境的志愿服务可以挑战援助场域的既有观念和实践，并通过建构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和学习的平等伙伴关系来挑战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伙伴关系（Schech et al., 2015）。

曾经作为国际发展话语叙述中被客体化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可以通过将美好未来的希望与全球正义、团结的价值观以及对世界的批判性理解联系起来，扩展发展的内涵（Noxolo, 2011）。正是基于这种可能性，联合国大会在《发展权利宣言》中承认“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因此，发展政策应使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sup>①</sup>。我国在《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中强调发展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提出“与时俱进的发展权理念”，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发展权的主体是人民”“发展权是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发展权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发展权的保障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权应为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等内涵<sup>②</sup>。

当前全球化语境下，一面是各国民族主义泛滥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另一面则是通过全球分工体系、产业链和供应链建立的日益密切的世界经济共同体。如何弥

① 联合国公约与宣言检索系统，《发展权利宣言》（<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41-128.shtml>），最后登录日期：2020年4月1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6，《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12月1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6-12/01/content\\_5141177.htm](http://www.gov.cn/zhengce/2016-12/01/content_5141177.htm)），最后登录日期：2020年4月1日。

合这种反向式裂痕已不是对个体或单个政治主体的提问，而是全人类需要完成的命题作文。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格局正面临重大调整甚至重构，而海外志愿服务作为国际秩序的一种表达形式，也面临同样的风险和机遇。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必须超越技术和财政援助，着眼于制定根本的解决方案（Nath，2014），“使我们能够共同生活在健康、可持续的社区，共同努力为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提供创新解决方案，从而塑造我们集体的命运”<sup>①</sup>。因此，海外志愿服务的发展话语实践需要“摆脱那些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将它们从它们在其中肆虐的阴影中驱逐出去”（福柯，2003：20—21）。所有国家主体都应该对国际社会有所担当，无论大小、强弱都应该成为某种程度上的负责任国家（梁凯音，2015）。因此，海外志愿服务应当走出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建构的、主客二分的话语叙事框架，超越“援助”的话语陈述方式，构建一种新的全球责任观。这对尚处于发展初期的我国海外志愿服务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我国的海外志愿服务发展不必遵循以往欧美国家海外志愿服务的发展援助路径，可以重新建构“发展”的话语群或确立新的话语策略，“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2017），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需要说明的是，国际学术界以文化研究领域从地景和空间视角对国际志愿服务过程中各种不平等关系的批判为主流，尤其集中于对国际志愿服务参与主体所处全球地理空间的“南—北”分化和彼此想象的批判和反思（Laurie & Smith，2018）。而“南—南”合作中，国际志愿服务的出现则被视为对“南—北”模式的一种“新的”对抗形式（Smith et al.，2018）。我国关于国际志愿服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以政策、制度、方式等介绍为主，这与我国志愿服务真正成规模地“走出去”兴起于21世纪初（张强、齐从鹏，2018）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不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本文采用福柯式话语形成的分析路径对海外志愿服务进行总体性分析的尝试可视为一种新视角的努力。但是，这种宏观且整体化的路径取向无疑会造成诸多细节甚至事件的缺失，也是本文的最大不足。

---

① 国际志愿者协会官方网站《全球志愿者宣言》（<https://www.iave.org/property/the-universal-declaration-on-furnaling/>），最后登录日期：2019年9月17日。《全球志愿者宣言》是国际志愿者协会倡导工作的基本框架，于1990年巴黎世界志愿者大会首次发布，2001年阿姆斯特丹世界志愿者大会修订并重新发布，用以启动联合国国际志愿者年。《全球志愿者宣言》倡导每一位女性、男性、儿童的自由结社权利和成为志愿者的权利，不论其文化、族裔、宗教、年龄、性别，以及身体、社会或经济状况如何。

## 参考文献:

- 戴闻名, 2015, 《中国何时迈入国际志愿者时代》, 《瞭望东方周刊》1月。
- 福柯, 米歇尔, 2003, 《知识考古学》, 谢强、马月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梁凯音, 2015, 《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话语权》, 《广东社会科学》第1期。
- 腾素芬, 2011, 《西方海外志愿服务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 习近平, 2017,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新华网, 10月27日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613458>)。
- 袁标、陈国栋, 2013, 《西方话语权权力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逻辑探究》, 《思想战线》第1期。
- 赵启正, 2011, 《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张强、齐从鹏, 2018, 《中国志愿服务走出去现状与趋势》, 《社会治理》第9期。
- 郑乐平, 2003, 《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新的社会理论空间之建构》,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Apthorpe, R. 2011, "With Alice in Aidland: A Seriously Satirical Allegory." In D. Mosse (ed.), *Adventures in Aidland: The Anthropology of Professional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xford: Berghahn.
- Biccum, A. 2007, "Marketing Development: Live 8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Global Citize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8 (6).
- Bondi, L. & N. Laurie 2005, "(Introduction) Working the Spaces of Neoliberalism: Activism, Professionalisation, and Incorporation." Special issue of *Antipode* 37 (3).
- Brown, N. 2011, "Student, Expert, Peacekeeper: Three Versions of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57 (1).
- Butcher, J. & P. Smith 2015, *Volunteer Tourism: The Lifestyl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bingdon: Routledge.
- Crossley, E. 2012, "Poor but Happy: Volunteer Tourists' Encounters with Poverty." *Tourism Geographies* 14 (2).
- Crush, J. (ed.) 1995, *Power of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Devereux, P., M. Paull, M. Hawkes & N. Georgeou 2017, "Volunteering and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Finding Common Ground betwee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Volunteering Agendas?" *Third Sector Review* 23 (1).
- Diprose, K. 2012, "Critical Distance: Doing Development Educ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Volunteering." *Area* 44 (2).
- Eyben, R. 2010, "Hiding Relations: The Irony of 'Effective Aid'."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2 (3).
- Franco, E. L. & T. Shahrokh 2015, "The Changing Tides of Volunteering in Development: Discours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DS Bulletin* 46 (5).
- Frontani, H. G. & L. C. Taylor 2009, "Development through Civic Service: The Peace Corps and National Service Programmes in Ghana."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9 (2).
- Guiney, T. & M. Mostafanezhad 201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rphanage Tourism in Cambodia." *Tourist Studies* 15 (2).
- Georgeou, N. & S. Engel 2011, "The Impact of Neoliberalism and New Managerialism on Development Volunteering: An

- Australian Case Study. ”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 ( 2 ) .
- Harrison , E. 2013, “Beyond the Looking Glass? ‘Aidland’ Reconsidered. ”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33 ( 3 ) .
- Howard , J. & D. Burns 2015, “Volunteering for Development within the New Ecosystem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IDS Bulletin* 46 ( 5 ) .
- Humble , D. & M. Smith 2007, “What Counts as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M. Smith ( ed. ) , *Negotiating Boundaries and Borders: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London: Elsevier.
- Lacey , A. & S. Ilcan 2006, “Voluntary Labor , Responsible Citizenship , and International NGO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47 ( 1 ) .
- Laurie , N. & M. B. Smith 2018, “Unsettling Geographies of Volunteering and Development. ”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3 ( 1 ) .
- Lewis , D. 2006,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rvice: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 *Voluntary Action* 7 ( 2 ) .
- 2015, “Community Volunteering in Korogocho. ” *VSO Report* ( [www.vso.org.uk/about/what - we - do/volunteering - for - development/valuingvolunteering](http://www.vso.org.uk/about/what-we-do/volunteering-for-development/valuingvolunteering)) .
- Lough , B. J. & C. Allum 2013, “Effects of Neoliberal Adjustments on Government-Funded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s. ”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23 ( 7 ) .
- Lyons , K. , J. Hanley , S. Wearing & J. Neil 2012, “Gap Year Tourism: Myths of Global Citizenship?”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9 ( 1 ) .
- Mostafanezhad , M. 2013, “The Geography of Compassion in Volunteer Tourism. ” *Tourism Geographies* 15 ( 2 ) .
- Murray , W. E. & J. D. Overton 2011, “Neoliberalism is Dead , Long Live Neoliberalism? Neostructur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Aid Regime of the 2000s. ”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11 ( 4 ) .
- Nath , P. 2014, “Volunteerism and the Post-2015 Agenda. ” *VSO Report* ( [www.vsointernational.org/sites/vso \\_ international/files/volunteerism - and - thepost - 2015 - agenda\\_ tcm76 - 41498\\_ 0. pdf](http://www.vsointernational.org/sites/vso_international/files/volunteerism-and-the-post-2015-agenda_tcm76-41498_0.pdf)) .
- Noxolo , P. 2011, “Postcolonial Economies of Development Volunteering. ” In J. Pollard , C. McEwan & A. Hughes ( eds. ) , *Postcolonial Economies*. London: Zed Books.
- OECD , 1996, “Shaping the 21st Century: The Contribution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 *OECD Report*. Paris: OECD.
- Peck , J. & N. Theodore 2010, “Mobilizing Policy: Models , Methods , and Mutations. ” *Geoforum* 41 ( 2 ) .
- Perold , H. , L. Graham , E. M. Mavungu , K. Cronin , L. Muchemwa & B. Lough 2013, “The Colonial Legacy of International Voluntary Service. ”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48 ( 2 ) .
- Picken , A. 2015, “Spokes of a Wheel: A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Led Volunteer Initiative. ” *VSO Report* ( [www.vsointernational.org/fighting - poverty/whatwe - do/volunteering - for - development/valuingvolunteering](http://www.vsointernational.org/fighting-poverty/whatwe-do/volunteering-for-development/valuingvolunteering)) .
- Rakodi , C. 2007 , *Working Paper 9: Understanding the Roles of Religions in Development: The Approach of the RAD Programme*. Report of Religions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Programme ,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Rovisco , M. 2009, “Relig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smopolitanism: Young Portuguese Volunteers in Africa. ” In M. Nowicka & M. Rovisco ( eds. ) , *Cosmopolitanism in Practice*. Aldershot: Ashgate. .

- Roy , A. 2010 , *Poverty Capital: Microfinance and the Making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 Schech , S. 2017 , “International Volunteering in a Changing Aidland. ” *Geography Compass* 11 ( 12 ) .
- Schech , S. , A. Mundkur , T. Skelton & U. Kothari 2015 , “New Spaces of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Volunteering. ”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15 ( 4 ) .
- Sin , H. L. 2010 , “Who are We Responsible to? Locals’ Tales of Volunteer Tourism. ” *Geoforum* 41 ( 6 ) .
- Simpson , K. 2004 , “ ‘ Doing Development ’ : the Gap Year , Volunteer-Tourists and a Popular Practice of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6 ( 5 ) .
- 2005 , “Dropping out of Signing up?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Youth Travel. ” *Antipode* 37 ( 3 ) .
- Smillie , I. 1995 , *The Alms Bazaar , Altruism under Fir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ITDG.
- Smith , M. B. & N. Laurie 2011 , “International Volunteering and Development: Global Citizenship and Neoliberal Professionalisation Today. ”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6 ( 4 ) .
- Smith , M. B , N. Laurie , P. Hopkins & E. Olson 2013 , “ International Volunteering , Faith and Subjectivity: Negotiating Cosmopolitanism , Citizenship and Development. ” *Geoforum* 45 ( <http://doi.org/10.1016/j.geoforum.2012.10.010> ) .
- Smith , M. B. , N. Laurie & M. Griffiths 2018 , “South-South Volunteering and Development. ”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84 ( 2 ) .
- Sobocinska , A. 2016 , “A New Kind of Mission: The Volunteer Graduate Scheme and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62 ( 3 ) .
- 2017 ,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N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Development Volunteering. ”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2 ( 1 ) .
- Turner , K. 2015 , “How Participatory Practice Can Help to Strengthen the Role of Volunteering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 Organisational Perspective. ” *IDS Bulletin* 46 ( 5 ) .
- Vrasti , W. & J. M. Montsion 2014 , “No Good Deed goes Unrewarded: The Values/Virtues of Transnational Volunteerism in Neoliberal Capital. ” *Global Society* 28 ( 3 ) .
- Windsor , D. 2006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ee Key Approaches. ”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3 ( 1 ) .
- Yea , S. 2018 , “Helping from Home: Singaporean Youth Volunteers with Migrant-Rights and Human-Trafficking NGOs in Singapore. ”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84 ( 2 ) .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罗 婧

example ,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lexible governance’ by various levels of Chinese governments in addressing disputes of nail household issue. It indicates that flexible governance , including active communication , material concessions , reasoning and emotional mobilization in the negotiations , are mainly used by the three levels of governments ( the sub-district , the district and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s) to respond to the appeals of nail households. As an “informal” response strategy , flexible governance is a strategic adjustment based on a rigi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 and its fundamental goal is to reach a bala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people’ s interests. This governance paradigm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enhancing the ability to resolve disput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 the ability to express residents’ interests and the ability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 but it can also trigger negative influences of profit-oriented protests and unfairness to law-abiding residents.

### Discourse Form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Volunteer Service

..... *Lin Hong* 106

**Abstract:**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ustry observation , this paper applies Foucault’ s discourse theory to analyze the discourse generation and change of overseas voluntary servic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established in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constructed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with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as the object of discourse, “aid” as the discourse statement , and “development” as the discourse framework. This discourse narrative has undergone periodic evolution and deconstructive reflection in the diachronic change of the global context , and it has become a shaping force of the global social reality. Now , overseas volunteer services need to go beyond assistance and reconstruct a broad sense of global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a new type of moral empathy.

### How to Build Credit: Toward the Structuration of Relationship in New Rural Fund Cooperatives

..... *Zhu Xingtao & Li Yifan* 124

**Abstract:**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of rural finance is important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a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an “ideal type” framework of credit and explains how credit is built in rural fund cooperatives with the expansion of trading range through a case stud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tructuration of relationship” is the core mechanism for building credi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 rural society is structured into the rule of modern finance; different actors supplement the attributes of social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emotional and instrumental sectors , endowing social relationship with new interactive rules to shape a multi-level form of credit.